

世界货币史上，由官方发行纸币的最早记录是中国北宋仁宗时期。北宋初，四川富民就开始发行纸币，称为交子。至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改由官府发行。终北、南两宋，纸币名称复杂多变，又称楮币、楮券、关子、会子等。在这个过程中，纸币发行中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当时就不少人对此进行了探讨。由于纸币在宋代初次发行，纸张本身价格低廉，对于世代代通常使用铜币的民众来说，纸币是否能长期稳定安全地流通使用，难免产生担心。对此，宋朝政府采取发行纸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和钱钞并用的措施，以取信于民。

对准备金的强调

《长编》卷272的附录中，记载了参知政事吕惠卿于熙宁八年（1075年）8月十三日记录的宋神宗与群臣论交子的一段对话。“上曰：‘交子自是钱对，盐钞自以盐对，两者自不相妨。’石曰：‘怎得许多做本？’上曰：‘但出纳尽，使民间信之，自不消本。’金曰：‘始初须要本，俟信后，然后带得行。’”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发行纸币，要有一定的“本”作为准备金。当纸币获得人们的信用后，才可以超过“本”而发行了。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1记载了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臣僚的建言：北宋初年四川行使交子，公家和私人都有好处，没有反对的意见，正是因为发行纸币的同时，政府有准备金可供民众随时兑换，因此能取信于民；但是，现在朝廷印造30万纸币，却未见到准备金，并且朝廷还要继续印造150

两宋纸币发行的得与失

□ 方宝璋

所以认为只要有2/3的准备金，就可以保证全部纸币的流通。周行己2/3准备金的理论虽然不一定是最恰当的比例，但他提出的纸币发行不需要十足准备金的理论，则是对货币管理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南宋初期，著名抗金将领李纲反对发行纸币，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目今户部财用窘迫，必无数百万桩留钱本，交子之行，止凭片纸……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这就是说，发行交子，如没有钱本，将为害无穷。但是，他又认为，如不得已要发行纸币，那纸币准备金的数量要占发行纸币总量的1/3左右。他说：“当时设法者措置得宜，常预桩留本钱一百万贯，以权三百万贯交子，公私物一，流通无阻，故蜀人便之。”李纲认为准备金比率在1/3左右比较合适，比北宋徽宗时周行己2/3准备金的比率估计更为准确。这与现代金融业中通常规定的28%准备金比率已很接近。

滥发纸币的后果

综观史籍，北宋时期，纸币的发行大多预留有准备金。据《宋史·食



货下三》载，“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因此，其大部分时间里纸币的发行还属正常，没有引起社会与经济的大波动。宋徽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及张商英秉政，奉诏复循旧法”，这场短期的超本钱发行的风波才算平复。

南宋初年，军费等浩大的开支使准备金难以筹措，宋高宗时为解决财政危机，朝廷发行纸币往往是不预留准备金，遂致社会人心惶惶，议论纷纷。如南宋绍兴年间，一位言者就揭露了这种情况：“广南、福建等六路交子三十万、两浙路交子一十万、临安府界小交子一十万，并见造江南、两浙预充杂本交子一百五十万，其合用钱本，并未见桩管，由是远近士民议论纷纷，皆以为不便。”与此相反，宋孝宗时，朝廷发行纸币比较重视预留准备金，就取得较好的成效，市场上纸币流通平稳。如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二十八日，诏左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平江、绍兴府，明、秀州主管盐事，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库印钞，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以备循环收换会子”。到了南宋后

纸币金属币并用的原则及其实际效果

南宋著名抗金将领辛弃疾支持发行纸币，主张国家税收要铜钱、纸币各征收一半，以增强人民对纸币的信任感。袁燮指出：“守铜楮相半之法……尚何忧铜钱之寡而楮币之轻乎！”“钱会中半”原是南宋政府的一项财政原则，但实施中往往走样。政府是会子的发行者，但自己就不相信会子，在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时多收钱少收会子，而支付时则多支会子少支钱，这只能引发百姓对纸币的更大不信任感，更不敢使用或储藏纸币。正由于钱、楮受到不同的待遇，因此社会上普遍认为：“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

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

南宋光宗时期，杨万里提出“母子相权”论，主张金属币（铜钱、铁钱）与纸币并行。他认为两淮有铁钱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铁钱的会子；江南有铜钱为母，所以可以流通代表铜钱的会子。这叫做“母子不相离”。反之，如果单有“子”（会子），而无“母”（铜钱、铁钱），则不能发行。如沿江八州军没有铁钱，铁钱会子“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因此难以流通。他这里所说的“母子相权”，就是指纸币可以兑为钱币。不过他所主张的兑现只是市场上钱币和纸币能自由兑换，不是政府实行的纸币兑现制度。在封建社会里，市场上的自由兑换，必须建立在政府纸币兑现的基础上。只有后者能够保持稳定的兑现制度，才能取信于民，实现前者的自由兑换。杨万里的“母子相权”论在当时是有放的矢的，南宋时期政府滥发纸币搜括百姓，以应付庞大的军事开支。而且政府发行了大量的会子之后自身又不愿接收，在百姓用纸币纳税或缴纳其他官项时，往往多方限制刁难。因此，杨万里主张纸币必须同金属货币同时流通，纸币能够和金属货币相兑换，这样才能被百姓所接受，实现流通。



中国古代的「和合」外交

□ 潘志宏



来，晏子在端台随侍，梁丘据也驾着车赶来。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与我和谐啊！”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是相同而已，怎么能说是和谐呢？”

晏子批评梁丘据能同而不能和：国君认为可以的，梁丘据也认为可以；国君说不可以的，梁丘据也说不可以。然后，晏子打比喻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并得出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与“同”，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

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在外交关系中也是如此，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也会存在分歧矛盾，但是应当认识到世界正是因为不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古代的外交故事告诉我们要认识到各自的的不同，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和合”共生。

“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

中国古代崇尚“和平友好”的“和合”外交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平友好”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墨子讲兼爱、非攻、止战，“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反对一切不正义的战争，倡导和平。世界各国，要交流，而不是交战；要对话，而不是对抗；要相爱，而不是相恶，特别是邻国之间更应当和平友好相处。

《左传》记载，鲁隐公六年，郑庄公侵入陈国，并获得胜利。但是在前几年，郑庄公曾经请求与陈国讲和，但是陈桓公没有答应。于是，陈国大臣五父就劝谏陈桓公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意思是说，与仁义相亲近，与邻国关系和平相善，这是我们国家之宝啊，您还是答应郑

国的请求吧！“亲仁善邻”体现古代儒家所追求的国与国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和睦友好的目标。

但是，没想到陈桓公却说：“宋国和卫国才是真正的祸患，郑国能做什么？”于是就没有答应郑国的请和。对于陈桓公的短浅目光，选择与邻为恶的做法，《左传》中评论说道：“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意思是君子说过，善不可丢失，恶不可滋长，这说的就是陈桓公吧！滋长了恶而不悔改，马上就取自取祸殃，即使想要挽救，又怎么能办得到呢！最后，陈桓公出走丧命，陈国也自此大乱，国势日衰，走向了灭亡。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亲仁善邻”是中国古代“和合”外交思想在诸侯国关系方面的运用。当下，中国有很多好邻居。中国坚持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贯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

正如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所讲的：“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

“国虽大，好战必亡。”国家即使再强大，但喜好战争也必然会败亡。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不希望战争的阴霾笼罩在自己头上，也不要对其他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也希望别人的国家繁荣富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像朋友一样、像同胞一样。就像西方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世界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只有创造“和平友好”的“和合”外交关系，才是人间正道。

“合作共赢”的外交目标

中国历来追求“合作共赢”的“和合”外交。只是自己发展，不如大家一起发展，加强互利合作，才能产生“1+1>2”的积极效应。作为中国海洋历史上的一大创举，郑和下西洋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与他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典范，创造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和合”外交。

明代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之间，朝廷派遣郑和先后7次远航西洋，历时28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航海事业的飞跃。对于郑和的航海成就，明史学家吴晗评价说：“可以说郑和是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最有成绩的航海家。”郑和率领了一支由200多艘大小船舶构成的庞大舰队，据资料记载每次航行的人数都在27000人上下，从中国太仓的刘家港起锚，航行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的地方到达了非洲。

最重要的是，尽管郑和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但是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侵略和掠夺他国的事情，更没有充当“海上霸主”，留下的只有中国同沿途各国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

郑和在出使的过程中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进行了大量的贸易往来，送出丝绸陶瓷等精美工艺品，换回自己各国的奢侈品和珍禽异兽。郑和给自己宣称下西洋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明永乐皇帝明确指出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恒遣使敷教化于海外诸番国”。这些无不彰显着向往合作共赢、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郑和的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声。因此可以称郑和为东西方交流的使者和伟大航海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郑和宝船至今仍被视为“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和合”外交的重要见证。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此时，我们更应当从中国古代的“和合”外交中汲取营养，助力形成“和而不同”“和平友好”“合作共赢”的“和合”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美好理想。



《史记》的“究天人之际”

□ 杨 波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到自己发愤著《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中“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往往容易理解，但对“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人们常常产生困惑。下面从“究天人之际”的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源远流长，要从颛顼时代说起。据《史记·历书》记载，颛顼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民神分离后，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神。重、黎之后，史学继兴，史家继巫之后，掌管天人之学。唐虞之际，夏商两代，重、黎氏“世序天地”。换句话说，从颛顼起，经过尧舜，到夏商，重、黎氏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到了周代，重、黎氏的后裔司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迁先祖“典天官事”的由来。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沟通天、人关系，这也是史官的原始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至司马迁。而作为重、黎之后，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由此可见，“究天人之际”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

内容丰富，要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起。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是西汉时的大儒。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把天象与政事联系起来。其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为后世谏诤之臣借“天象示警”劝谏皇帝改良政治、革除弊端也同样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用心，企图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来限制君权，不要为所欲为，使之免遭败亡，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学说来束缚手脚的，反而用来开脱自己的罪责，借以愚弄人民，走向了董仲舒立意的反面。

这种思想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

响，在《史记·天官书》中也记载了不少天人感应的例证，但是，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与“天人感应”是截然不同的。“究天人之际”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讲天人相分，旨在阐明成败兴衰在于人心向背，往往容易理解，但对“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人们常常产生困惑。下面从“究天人之际”的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和影响深远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源远流长，要从颛顼时代说起。据《史记·历书》记载，颛顼时，“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民神分离后，重、黎掌司天地，以沟通民神。重、黎之后，史学继兴，史家继巫之后，掌管天人之学。唐虞之际，夏商两代，重、黎氏“世序天地”。换句话说，从颛顼起，经过尧舜，到夏商，重、黎氏都是以“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到了周代，重、黎氏的后裔司马氏“世典周史”。这是司马迁先祖“典天官事”的由来。司马迁先祖的职责是“绝地天通”，协调与沟通天、人关系，这也是史官的原始职责。而这一职责，以家族传承的方式，从重、黎时代，一直延续至司马迁。而作为重、黎之后，司马氏父子均是自觉地以沟通天地为神圣使命。由此可见，“究天人之际”不是司马迁的发明，而是具有悠久的历史。司马迁《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意图，主要来源于他的家族传统。

内容丰富，要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起。董仲舒是司马迁的老师，是西汉时的大儒。他提出“天人感应”学说，把天象与政事联系起来。其影响有两方面：一是为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为后世谏诤之臣借“天象示警”劝谏皇帝改良政治、革除弊端也同样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的用心，企图用“天人感应”的学说来限制君权，不要为所欲为，使之免遭败亡，以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但是统治者是不会用这种学说来束缚手脚的，反而用来开脱自己的罪责，借以愚弄人民，走向了董仲舒立意的反面。

这种思想对司马迁有一定的影

响深远，要从四个对子说起。《史记》的“究天人之际”，把天道与人道区别开来，强调人道近；把天命与人为区别开来，强调事在人为；把天象与人事区别开来，强调人事有代谢。总而言之，是把神与民区别开来，强调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史记》注重历史研究以人物为中心，原原本本地总结人为的历史经验，探寻治乱之源，使神的观念远离中华民族的头脑，为后世正史作出了旗帜鲜明的表率。《史记》的“究天人之际”尊重理性，强调人事，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年，可谓深远矣。